

毛泽东与 斯大林 蒋介石

(下)

袁南生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

与斯大林、
蒋若(下)

袁南生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与斯大林、蒋介石 / 袁南生著. —2 版.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12

ISBN 7-5438-2143-5

I . 毛… II . 袁… III . ①毛泽东(1893~1976) - 生平
事迹②斯大林, J. V. (1879~1953) - 生平事迹③蒋介石
(1887~1975) - 生平事迹 IV . ①A752②A742③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2107 号

责任编辑：李声笑
装帧设计：廖 铁

毛泽东与斯大林、蒋介石

袁南生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邮编: 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2003 年 12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29

字数: 791,000 印数: 1~5,000

ISBN7-5438-2143-5
K · 381 定价: 46.50 元

目 录

(上)	蒋介石对苏俄的秘密访问 ······	·
(下)	周恩来对苏联的访问 ······	·
第一章 莫斯科为毛泽东发的讣告 ······ (1)		
●	讣告原文的发现 ······	(1)
●	一个美国人的最先发现 ······	(4)
●	莫斯科最先介绍毛泽东生平的竟是一份讣告 ······	(7)
●	毛泽东知道莫斯科为他发讣告吗? ······	(10)
●	讣告之谜留下的思考 ······	(12)
第二章 斯大林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崛起 ······ (15)		
●	《遗嘱》之谜 ······	(15)
●	斯大林崛起的第一部曲 ······	(21)
●	斯大林崛起的第二部曲 ······	(24)
●	斯大林崛起的第三部曲 ······	(29)
第三章 蒋介石对苏俄的秘密访问 ······ (38)		
●	一个奇怪而又神秘的代表团 ······	(38)
●	孙中山为什么选中了蒋介石? ······	(40)
●	共产国际劝蒋介石加入共产党 ······	(45)

● 蒋介石眼中的托洛茨基	(50)
● 蒋介石对苏俄的印象	(54)
第四章 联合吴佩孚还是联合孙中山?	(61)
● 最先提出国共合作构想的是谁?	(61)
● 两个重要人物、两个重要报告	(65)
● 孙中山与 20 岁的苏俄全权代表的会晤	(69)
● 第一个苏俄赴华外交使团的失败	(73)
● 苏俄关于“东方拉巴洛条约”构想的失败	(77)
● 莫斯科由联合吴佩孚转向联合孙中山	(83)
● 历史性的宣言	(86)
第五章 毛泽东、陈独秀、蒋介石与斯内夫利特战略	(94)
● 马林的 4 次使华	(94)
● 毛泽东眼中的“斯内夫利特战略”	(101)
● 陈独秀眼中的“斯内夫利特战略”	(108)
● 蒋介石眼中的“斯内夫利特战略”	(125)
第六章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	(133)
● 国民党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洋顾问	(133)
● 斯大林和“中华民国的新纪元”	(138)
● 莫斯科援助下的黄埔军校	(151)
● 斯大林第一次给蒋介石派出军事总顾问	(158)
第七章 冯玉祥政变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新重点	(171)
● 冯玉祥的左转与斯大林的援助	(171)
● 孙中山的北上和苏俄“赤化”北京的传言	(177)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建立	(184)
● 毛泽东主持选派学生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0)
● 胡汉民与斯大林探讨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	(199)
● 斯大林允诺为冯玉祥装备 40 万部队	(212)

第八章 蒋介石的崛起和斯大林的支持	(223)
● 斯大林派来的使团怎样处理“中山舰事件”?	(223)
● 布哈林怎样看待《整理党务案》?	(242)
● 加它再度来华和北伐大进军	(251)
● 帮助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	(258)
第九章 斯大林为挽救大革命而做出的努力	(268)
● 共产国际眼中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	(268)
● 来自印度的斯大林的首席代表	(273)
● 斯大林为中国大革命开的第一个药方	(278)
● 罗易对付蒋介石的“灵丹妙药”	(285)
● 东征讨蒋还是继续北伐?	(293)
● 斯大林为中国大革命开的第二个药方	(301)
● 罗易指导下的中共五大	(306)
● 斯大林为中国大革命开的第三个药方	(310)
● 斯大林的指导和所谓“陈独秀主义”	(326)
●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仅仅是“右”吗?	(335)
第十章 莫斯科关于中国大革命的尖锐争论	(338)
● 共产国际历史上一次既动口又动手的激烈争论	(338)
● 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关于中国大革命的根本分歧	(347)
●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革命观点的明显差异	(358)
● 季诺维也夫对中国革命态度的历史性转变	(361)
● 南昌起义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立场逐渐反转	(365)
●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争论说明了什么?	(376)
第十一章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工农苏维埃战略	(385)
● 毛泽东在罗明纳兹主持的会议上第一个发言批评陈独秀	

● 苏维埃口号的提出	(393)
● 斯大林派来的德国暴动专家诺伊曼与广州起义	(398)
● 蒋介石政府对斯大林的报复	(403)
● 罗明纳兹的失宠与米夫的崛起	(405)
● 斯大林眼皮底下召开的中共六大	(409)
第十二章 斯大林和蒋介石角逐中东路	(414)
● 斯大林派兵和张少帅兵戎相见	(414)
● 六大中央高举起“保卫苏联”的大旗	(417)
● 大起大落的“立三中央”	(420)
(下)	
第十三章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另眼相看	(429)
● 是压毛泽东，还是抬毛泽东？	(429)
● 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	(438)
● 是肯定颂扬为主，还是打击排斥为主？	(449)
● 是重视王明，还是重视毛泽东？	(458)
● 是支持张国焘，还是支持毛泽东？	(463)
第十四章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幕后的角逐	(471)
● 斯大林和蒋介石“握手言和”	(471)
● 蒋介石派陈立夫密访斯大林	(474)
● 蒋介石亲自出马谋求与斯大林结盟	(481)
● 西安事变中斯大林谴责张学良	(485)
● 莫斯科和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496)
● 斯大林让小蒋回到老蒋身边	(500)
第十五章 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与斯大林	(511)
● 反蒋抗日、联蒋抗日和逼蒋抗日	(511)

● 共产国际批评毛泽东“采取了错误的步骤”	(520)
● 斯大林派王明、康生等回国	(530)
● “捧着‘尚方宝剑’的斯大林的天使”	(534)
● 莫斯科在毛泽东和王明之间作出裁决	(545)
● 斯大林是否武器给了蒋介石，书籍给了毛泽东？	(559)
第十六章 毛泽东与莫斯科在皖南事变问题上的矛盾	(570)
●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斯大林与毛泽东关系的升温	(570)
● 斯大林给蒋介石派来了新的军事总顾问	(587)
● 莫斯科认为蒋介石不是法国的贝当元帅	(599)
第十七章 盛世才：斯大林、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拉拢的对象	(609)
● 斯大林出兵助盛世才作战	(609)
● 斯大林批准盛世才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616)
● 驻扎在新疆、穿中国军装的苏联军队	(622)
● 盛世才由亲苏联共转为亲蒋反共	(626)
● 蒋介石清除苏联在新疆的影响	(632)
第十八章 斯大林和毛泽东上下级关系的终结	(638)
● 延安与莫斯科围绕保卫苏联展开的争论	(638)
● 毛泽东摆脱“国际指挥中心”共产国际的关键一步	(648)
● 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解散	(657)
● 季米特洛夫忘不了为王明、周恩来说话	(664)
● 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和成为中共指导思想的国际条件	(671)
第十九章 共产国际解散后的三强角逐（上）	(682)
● 毛泽东因斯大林来电而“大发雷霆”	(682)

● 毛泽东不知道的一个秘密	(690)
● 斯大林出兵中国的幕后交易	(696)
● 蒋介石对斯大林的重大让步	(704)
● 斯大林与杜鲁门在东北撤军问题上的较量	(710)
● 斯大林终于给毛泽东提供了几十万件武器装备	(718)
● 斯大林怀疑毛泽东是不是另一个铁托	(726)
● 开国前毛泽东与斯大林频繁的秘密交涉	(741)
● 斯大林向刘少奇敬酒	(750)
第二十章 共产国际解散后的三强角逐（下）	(765)
● 苏联为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而摇旗呐喊	(765)
● 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握手	(773)
● 斯大林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到莫斯科参加谈判	(783)
● 是首先解放台湾，还是首先统一朝鲜	(799)
● 斯大林鼓动新中国出兵援朝	(810)
● 斯大林不想在朝鲜停战	(826)
● 斯大林晚年与毛泽东的交往	(841)
第二十一章 结语：并非多余的话	(848)
● 毛泽东确实对得起斯大林	(848)
● 蒋介石晚年眼中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	(864)
● 斯大林驻华代表和在共产国际任职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归宿	(873)
主要参考书目	(886)
修订版后记	(895)

第十三章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另眼相看

是压毛泽东，还是抬毛泽东？

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和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

——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电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

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一手操纵的这次会议上，米夫提名毛泽东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的实践证明，这并没有为毛泽东带来实际上的利益，相反，在遭到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者的严厉批评之后，毛泽东又受到了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者更加严厉的排斥、打击。可以说，在随之而来的几年中，毛泽东受尽了“窝囊气”。

毛泽东之所以受“窝囊气”，一个主要的原因就

是王明的崛起。

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米夫的扶持下，一步登天，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当时，向忠发仍是总书记，但只是一个名义，实权逐步转移到了王明的手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人，生于1904年，1924年8月进入武昌商科大学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取俄文名“波波维奇”，又叫“马马维奇”。1926年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向导》编辑。大革命失败后，又去苏联。1929年回到上海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30年底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王明上台后，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政策，派遣要员渗透苏区，“钦差大臣”满天飞，高扬“转变路线”的大旗，四处扫荡异己，对持不同意见者，不择手段进行排斥和打击。

王明最初是想拉一把毛泽东。但他很快发觉毛泽东非等闲之辈，毛有一套自己的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并有自己的战略和策略，绝不是拉一把就能拉过来的人。

况且，毛泽东的资历比王明老，威信比王明高，这成为王明“左”倾错误在苏区党和军队内贯彻执行的巨大障碍。王明深知这一点。王明要控制中央苏区的领导权，不能不排挤毛泽东，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

为了对付毛泽东，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采取了三个步骤。

第一是取消毛泽东对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权。

1931年4月，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又称“三人团”）由上海抵达苏区，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开展反右倾斗争。

1931年11月，“三人团”主持召开了赣南会议。会议在“集中火力反右倾”的纲领指导下，批判了毛泽东的三大“错误”：

一是“狭隘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二是“富农路线”。因为当时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而毛泽东主张“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主张给地主、富农以出路。

三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

会议全盘否定毛泽东在苏区的成就，撤销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排挤他对苏区中央局的领导。

第二是削弱毛泽东的军权。

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来的第一号电报指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主席团，决定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

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主席、副主席完全按中央一号电报开列的名单任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宣布取消原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全国红色军队集中统一于“中革军委”指挥。这样，就取消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遭到削弱。

第三是将毛泽东排挤出军队。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又在宁都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是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为代表的正确政治军事战略，同王明“左”倾错误长期斗争的总爆发。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左”倾指示，否定了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主张红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党的群众力量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意见，指责他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是“等待主义”，要求给予“及时和无情的打击”。

会上对毛泽东进行了无理的指责和错误的批判。

现存的档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这样表述：

“会议中批评了毛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会议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因此，尽管周恩来力争，会议还是撤销了毛泽东刚恢复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调他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取消了他对红军的领导。

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反动派捕杀，王明代理党的总书记。但是，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代理总书记工作艰苦，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王明盘算再三，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同年11月，王明辞去代理总书记的职务，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交给年仅24岁的博古，让他出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自己携妻子孟庆树离开上海到了莫斯科。

临别时，王明再三嘱咐博古：“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

王明到苏联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被共产国际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这时的王明，本身已经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他坐镇莫斯科，通过无线电遥控上海以博古为新“舵手”的中共中央，再由博古向瑞金发出种种指示。这实际上是斯大林、共产国际通过其指导下的王明等人实现了对中共中央的遥控。

1933年初，临时中央由于白区工作遭到破坏，无法立脚，被迫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博古、张闻天等沿着秘密通道，由上海来到瑞金，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他们既把毛泽东架空，又打击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终于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那么，这段时间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态度怎样呢？

1930年5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不止一次地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或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谈到中国革命的方法问题。他显然

已经意识到，中国革命照搬俄国革命的一切可能走不通，毛泽东和朱德依靠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办法也许能够为中共夺取政权创造条件。

斯大林曾向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提出：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①

斯大林这样说，实际上是用一种间接的方式，肯定毛泽东的路走对了。

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开始公开肯定毛泽东式的革命道路，态度鲜明地要求中共迅速将其主要干部和整个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去。

1930年秋天，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召开时，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传达了斯大林的有关指示，毛泽东得以顺理成章地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王明宗派主义集团把持了中央。这时，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在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按照惯例，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应该担任未来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向忠发考虑他不在苏区，而在上海秘密状态下工作，并且很少可能前往瑞金，因此，他主动提议，由创立了这一根据地，并身为根据地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来任政府主席。

谁担任政府主席，这是一项重要的人事安排。中共中央把总书记的这一提议先报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继而又转报到莫斯科，很快得到了莫斯科的认可。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连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都不是的毛泽东，一跃而为苏维埃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在注重形式和名分的莫斯科看来，毛泽东的地位已是举足轻重的了。

^① 参见青石：《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了吗？》，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

毛泽东虽然担任了政府主席，但仍旧兼任红军总政委，坚持随军行动，并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指挥军队作战方面。然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受莫斯科原则指示的影响，习惯于按政治教条看待军事作战的方针，很快与毛泽东避敌锋芒的游击防御战术思想发生了意见分歧。

1932年秋天，在国民党大举“围剿”期间，毛泽东坚决反对采取“进攻路线”，由此发生了毛泽东与中央局多数人的激烈争论。中央局多数人一致提议取消毛泽东的军权，由周恩来接任了总政委一职。

想不到，这一情况报给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再报到莫斯科以后，无论是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还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都一致反对。

可以推测，王明是会站在博古一边的。当共产国际站在毛泽东一边的时候，王明转而请求苏共中央给予指示。本来，苏联共产党也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是世界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但是，事实上，共产国际是苏联共产党为主创立的，领导权掌握在苏共中央手里，连经费也是苏联给的，因而，苏共中央反而成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

王明将发生在中央苏区的争论上报苏共中央后，苏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专门研究了中央苏区面临的形势，尽管他们也认为毛泽东的“纯粹防御路线”是不对的，但他们明确认为不应该将毛泽东从前线召回，并取消其军权。莫斯科随后发给上海转往苏区中央局的电报明确指出：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上有丰富经验，召回毛泽东不仅可能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

可惜，莫斯科的裁决来得太迟了，事情已经难以挽回。

本来在根据地握有实权的毛泽东，党、军、政三权依次被削，逐渐成了“光杆司令”。没想到，共产国际于1933年3月致电中共中央，特别提醒博古等人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不要走得太远，强调“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

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和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①。

博古等人在共产国际的这一态度的影响下，也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改变对毛泽东的“冷淡态度”。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代表李德回忆说：

“直到 1932 年底和 1933 年初，我们在上海委员会见面时，还多次谈到过这个冲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阿瑟·尤尔特同志以及博古、洛甫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都不同意对毛泽东采取‘冷淡态度’，在给瑞金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指示中，他们都强调‘一定要使毛泽东的情绪改变过来’，并且强调指出，一定要使他通力合作。”^②

1933 年底，由于在苏区建设尤其是查田运动中临时中央与毛泽东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冲突，毛泽东再度称病告假，博古等人竟然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这就是让毛泽东离开中央苏区到莫斯科去，美其名曰到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去养病。

博古等人关心毛泽东的身体健康不能说完全是假，但借此达到将毛泽东一脚踢开，完全消除毛泽东在苏区的影响的确是真。

博古等人没有料到，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据吴黎平回忆：“中央曾开会讨论苏区财政问题，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③

1934 年 1 月，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相继在中央苏区召开。按照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最初的想法，他希望借这两次会议把毛泽东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即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两职一并取消。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博古提交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酝酿名单中已没有毛泽东的名字，但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审定之后，否定了博古的意

^① 转引自《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第 83 页。

^② 李德：《中国纪事》，第 24 页。

^③ 转引自申长友：《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第 152 页。

见。由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人最后圈定的名单里，毛泽东不仅继续得以留在政治局，而且被异乎寻常地提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结果，博古故意不通知毛泽东参加在苏区召开的中央全会，却又不得不把毛泽东选为仅有的政治局9名正式委员之一。

也许，博古想取消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使毛泽东成了正式委员，他因此憋了一肚子气，后悔不该事先请示共产国际。于是，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人事安排的问题上，他刻意将自己的名字排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名单的第一位，将王明的名字排在第二位，将身为主席的毛泽东的名字排在了后面。他便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自做主张，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免去了毛泽东的政府主席职务，只给毛泽东留下了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而将政府主席的头衔给了张闻天。

于是，毛泽东刚刚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只有几天，就失去了政府主席的职务，几乎与此同时，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却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在“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我们现在已经在几百个县建立了巩固的苏维埃政权。

不久，共产国际得知中共中央擅作主张，以张闻天取代毛泽东，担任了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王明通知中共中央：莫斯科“很不满意”。

毛泽东失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的职务几个月后，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消息才传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只是收到了大会开幕典礼的有关资料和毛泽东以上一届人民委员会主席名义作的报告和结论这两个小册子。此时，莫斯科对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对毛泽东是什么态度一清二楚，但他们接到毛泽东这两个讲话稿以后，无一例外地给予了高度评价。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将其翻译成多种语言，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

8月3日，在给中共中央的密信中，王明说：